

词体豪放与婉约之争的历史与启示

易翰君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关于苏词与豪放词风争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在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二在界定标准的多维性,三在接受境况的多变性。因苏词而引发的这些争论,让我们加深了对文学复杂性与多变性的理解,并且提醒我们在进行具体的批评过程中,要注意精细研究与宏观批评的结合、历史生成与逻辑推理的结合、作家作品研究与作家作品阐释研究的结合。

关键词:宋词;豪放;婉约;苏轼

在词学研究史上,因苏词而引发的豪放与婉约之争、尊体与辨体之论历久不衰。这种讨论并不囿于苏词本身的特征,甚至也不限于与此相关的宋词的体派问题,而是广泛涉及词体的演变、文学的风格乃至学术变迁的理据与背景问题,所以对这种典型个案进行学术的梳理与评判,始终具有重要的意义。

—

苏词“自是一家”,前人早有论述。《说郛》卷二十四引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子,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居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倾倒。”晁无咎也说:“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能改斋漫录》)胡寅《向子湮酒边词序》则云:“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柳氏为舆台也。”因其词风迥异于花间的雅趣与宋初的婉约,明人张綖称之为“豪放”,并将其与婉约对举:“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诗余图谱》)

对于苏词风格的迥异,也不乏质疑与批评,李清照即称苏轼:“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论词》)陈师道也指出:“退之以文为诗,苏轼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语》)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诗余》则说:“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各因其质,而词贵感

人,要当以婉约为正。”与张綖一样,他在以婉约、豪放划分词体风格之时,已强调婉约为正宗,并隐含词派之义。到清初的王士禛,则直称“婉约”与“豪放”两派。

20 世纪的现代词学承此而来,通行以豪放与婉约为依据划分宋词的风格流派,并据此评价作家作品,引发出了更多的争议。一方肯定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在词体变革中的重要意义,认为豪放词要高于婉约词。早年胡适就主张词要充分体现作者的天才个性与情感,所以他赞扬“诗人之词”,而贬斥“匠人之词”,他说:“苏东坡一班人以绝顶的天才,采用这新起的词体,来作他们的‘新诗’。从此以后,词便大变了。”(《词选》自序》)^[1]⁴⁷⁰ 20 世纪 30 年代,胡云翼在其《中国词史略》和《中国词史大纲》中,发挥胡适的观点,将词分为女性的词与男性的词两种,并对应于凄婉绰约与豪放悲壮二类词风,认为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风要高于婉约派。对苏辛词派的推崇,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达到了高峰,通行的文学史著作,都以豪放和婉约给宋代词人划线并以此区判作家作品的高低。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学者们对以往豪放、婉约二分的方法开始进行反思,婉约词的历史地位不断被抬高,与之相关的研究也在持续升温,而豪放词的价值乃至其存在却受到质疑。1980 年,在致周楞伽的,以《词的“派”与“体”之争》为题的几封书信里,施蛰存指出:不能以豪放、婉约将宋代词人“截然分为二派。”^[2] 在 1981 年第 1 期的《西北大学学报》上,谈文良在其《宋人是否以婉约派分词派等三题》一文中,重申施蛰存的意见,并加以发挥,认为虽然词分婉约、豪放已是宋人论词的意思,但宋人并没有以此分派,后人将雅派词人归入婉约派之列,也非宋人的意见。1949 年以后的词学界过分贬低婉约词,“给宋词研究工作带来诸多弊病。”造成我们对宋代许多大词人的研究和肯定都不够,影响到人们对宋

*收稿日期: 2009-03-02

作者简介: 易翰君,男,湖南株洲人,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大学语文教学与研究。

词全貌的了解。^[3]

更进一步的意见,则是釜底抽薪,完全否认有所谓豪放词或豪放派的存在。吴世昌在《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中指出:“苏词中‘豪放’者其实极少。若因此而指苏东坡是豪放派的代表,或者说,苏词的特点就是‘豪放’,那是以偏概全,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是对苏词的歪曲,对作者也是不公正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北宋根本没有豪放派。”^[4]此后,吴世昌又发表了《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一文,进一步申论“北宋的词人根本没有形成什么派,也没有区别他们的作品为‘婉约’、‘豪放’两派。”他认为:“笼统说来,北宋各家,凡是填得好词的的都源于‘花间’。你说他们全都是‘花间派’倒没有什么不可,但也不必多此一举,因为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人人皆知,视为当然之事……所以我们如果说,五代北宋没有词派,比硬指某人属于某派,更符合历史事实。”他甚至认为苏轼亦沿袭了“花间”词风,并没有改变什么词坛风气。至于南宋词人的作品,是在国土沦亡、宋室偏安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在这种局面之下写出来的作品,当然是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所以南宋词人中多有所谓‘豪放派’、‘忠义派’才对。‘豪放’二字多少还有点挥洒自如,满不在乎,豁达大度的含义。所以豪放、婉约这些名目,在当时并无人用,只有后世好弄笔头或好贴签条的论客,才爱用以导演古人,听我调度。而且当时词的作风内容,主要也当然是受政局变化而引起的。”^[5]

总而言之,关于苏词与豪放词风的争论,既关乎苏词本身的特点,也牵涉到宋词流派的划分乃至整个文学史、学术史变迁的问题,殊为复杂。

二

产生这些争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体而言,一在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二在界定标准的多维性,三在接受境况的多变性。

按理论家们的说法,文学是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文学是心灵的窗户,文学也是一个独特的语言结构,文学还是一个有读者参与的生产与消费紧密结合的系统。周逊《词品序》云:“山林之词清以激,感遇之词凄以哀,闺阁之词悦以解,登览之词悲以壮,讽谕之词婉以切。”单是题材不同,词风可能就各各不一,更遑论作品表现手法的区分、作家心志情怀的异同与读者的审美习惯的差别。文学正因其广泛的包容性与阐释性而呈现出极大的丰富性,而从这丰富性中呈现出来的种种特性之和才构成其中某一作家、某一作品或某一流派的风格。反过来,当我们分析某一作家作品或流派时便不能不考虑他们原初的复杂的“居处”场域。

庄子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不同的界定标准得出的当然会是不同的结论。对于苏词以及宋词的评判,有人从数量的多寡出发,有人强调贡献的大小,有人执著于题材的异同,有人拘泥于形式的正变,自然会产生种种分歧与争论。婉约、豪放的二分法,便于从总体上把握宋词的风格及

词人的大致分野,但无疑会显得过于粗略,所以清人又提出不少新的说法,有以时而论者,有以地而划者,有以人而分者,也有以正变而判者。以时而论者如龙炯,认为“词之系宋,犹诗之系唐”,故将宋词分为“初、盛、中、晚”。以地而划者如厉鹗,分宋词如画家之分南宗、北宗二派,以辛弃疾、刘克庄诸人为“词之北宗”,而以周邦彦、姜夔诸人为“词之南宗”(《张今涪红螺词序》、《樊榭山房全集》卷四)。以人而分者,有三派说,如汪懋麟、江顺诒等,以秦、柳、苏、辛、姜、张为宋词三派;有四派说,如郭麐《灵芬馆词话》在前面三派之上外加宋初晏、欧一派;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又有十四派之说。以正变而判者如宋黄大舆,曾以词置于“变风”之列,明清人则将词派的“正变”之说更加系统化。王世贞《弇州山人评词》,曾以二晏、柳永、张先、周邦彦、秦观、李清照为“词之正宗”,而以苏轼、黄庭贤、辛弃疾等为“词之变体”;王士禛、周济等也以婉约为正宗,以豪放为变格。具体到苏轼,有人认为他“绮罗香泽”之词比谁都多,竟超过欧阳修、柳永、张先、宋祁等北宋初期“婉约派”词人同类作品的总和,所以不能称之为“豪放”。反对者则认为:“判断风格、流派并不主要决定同类作家作品数量之多少”,而“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些作家作品是否是一种开风气的、有影响的预示着发展前途的新生力量,是否形成一种不同的创作倾向”。^[6]孰是孰非,实在难于判决。

横看成岭侧成峰,词风研究中究竟要重视载道的功能,还是形制的规范,是要立足于词家个人的特性,还是整个词史的变迁?不同的接受视角也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接受的角度而言,所谓“婉约”、“豪放”,与其说是宋词本身固有的风格,不如说是后来的阅读和理解者试图依托宋词所阐明的关于他们自我的存在。上个世纪60年代学术界的主流声音,都以苏、辛为词坛革命者和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附加了不少政治的、道德的因素。相反对婉约派词人评价偏低、否定过多。万云骏曾在其《论词的艺术性》一文中提出过异议,认为婉约派的词,虽说以离别相思、伤春伤别为主要内容,一般都带着浓厚的感伤主义色彩,表现手法有时比较曲折而深婉,但一般说是属于“政治上无害”的作品。^[7]但这种看法遭到了的反驳,吴文治指出:“词为艳科”、“诗庄词媚”,是婉约派词人的基本观念,所以“婉约派词人往往以轻佻的笔墨来反映贵族士大夫荒淫糜烂的生活和他们的精神状态,因而在他们的创作中曾出现了不少轻浮绮靡的色情作品。”而这类作品是容易毒害青年的。此外,他认为婉约派词还有很多感伤情调很浓,宣扬人生无常的作品,也是充满了毒素的,所以决不能笼统地说它们“政治上无害”。又说:“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婉约派词人在艺术上虽有很高的成就,但由于他们很少反映当时的时代精神,很少抒写当时人民的思想感情,因此总的评价不可能是很高的。我们决不能仅仅因为看到‘其表现手法,有时比较曲折而深婉,’因而抬高对他们的评价。”^[8]1979年,万云骏旧事重提,撰文说:“解放以来出版的有些文学史和词的选注本,对于宋词的婉约派和豪放派,评价不免偏颇,既对某些词人及其作品缺乏实事求是的

分析态度,也和当时词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相符合。”^[9]

三

如前所述,文学现象本身是复杂多变的,因苏词而引发的这些林林总总的争论,无疑让我们加深了对文学复杂性与多变性的理解。

就以风格而言,它涉及到一般的风格论(风格范畴和类型理论),以及文体风格、时代风格、地域风格、作家风格、流派风格等众多的领域和某一风格的不同层级。更具体地说,风格体现在文学作品的各个要素中,它既表现在作家对题材选择的习惯、对主题挖掘的视角,也表现为对创作手法的运用、对艺术语言的驾驭等的独特性,甚而体现在作家个人特有的思想、情感、审美理想等与读者交流的方式上。此外,风格的多样化与同一性又往往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现象。这些都是我们在进行作品风格的评析前应当具有的态度与准备。

在具体的批评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精细研究与宏观批评的结合,历史生成与逻辑推理的结合,作家作品研究与作家作品阐释研究的结合。

豪放与婉约本是宏观而又粗略的分词方法,任何文体都可通用,并不能具体真切地概括原本多样丰富的作家作品风格,因此郭麐、杨伯夔仿效《二十四诗品》,以诗论词,作《词品》《续词品》,从艺术形象的风貌形态出发讲词的艺术风格,形象地描述了幽秀、高超、雄放、委曲、清脆、神韵、感慨、奇丽等24种不同的风格特征。而江顺诒的《词学集成》则将词分为“柔腻”、“疏秀”、“明润”、“俊逸”、“绵远”等五品。近人詹安泰《宋词风格流派略谈》则说:“照我的浅见,宋词的艺术风格,可归纳为: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婉约清新、奇艳俊秀、典丽精工、豪迈奔放、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派,每派各有代表作家和附属作家。”^[10]从细处看,两宋词风确非“婉约”、“豪放”二类所能并包,具体到某一个作家比如苏轼,其作品风格原本也是多样统一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的分析时要能够沉潜深入。以豪放和婉约划分宋词流派受到质疑,并引起争论,说明它本身存在着过于简单笼统的毛病,但这种说法能够沿用至今,也肯定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在文学现象的分析中,宏观的思路与眼光也不可忽略,豪放与婉约之分、正体与变格之别大体能反映宋词风格的基本类型与变革过程。它跟“刚与柔”、“男与女”、“内与外”、“雅与俗”、“疏与密”、“自然与雕琢”等许多成对出现的概念一样,都本于中国古代阴阳两元对立的哲学思维。所以对于文学风格的分析,既要学会沉潜分析,也要做到凌空综会,既重细节的分析,于细微处见功夫,也顾及大类的区分,从高处看春秋。就学术史本身而言,既要尊重豪放与婉约、尊体与辨体的论争,又要超越于这种论争。

文学风格的研究当然要尊重历史事实,这里所讲的历史事实,既包括作家作品的事实,也包括一般读者与专门鉴赏者、评论家们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事实。就作家作品的事实

而言,苏轼乃至整个北宋可称为“豪放”的作品确实不多,苏轼乃至宋人也未曾自封为“豪放”一派,但同样可称为事实的还有苏轼在词坛上别树一帜,开豪放先河,而将宋词概括为豪放与婉约两派也不仅仅是简单沿袭明人的旧说,而是观赏者以总体感受为基础,以约定俗成的方式生成的。便是从逻辑上说,豪放词风的存在也有其必然的合理性。因为词调的音乐风格有豪放与婉约之别,词的题材内容有豪放与婉约之别,词人的性情、襟抱、遭际也有豪放与婉约之别,作为总体的词的文本风格有豪放与婉约之别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然反过来,不同的逻辑标准又可以产生不同的分类方式。这就要求将历史事实与逻辑推理结合起来,在事实的基础上梳理逻辑,再将逻辑运用于事实的整理。

在接受美学或现代解释学者看来,任何文学本文都具有未定性,都不是决定性的或自足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多层面的未完成的图式结构。它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仅仅在于人们可以对它作出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既可以因人而异,也可以因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无论哪一种解释都是具有意义的,也是合理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仅作家作品的研究是必要而有价值的,作家作品的阐释研究同样重要而有必要。在海德格尔看来,解释学不应是研究我们如何被动地理解文献、历史和他人,而应把注意力投放到去感悟通过理解原典存在的那些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明、清两代人对宋词的不同态度昭示的是他们自己的生存原则,而20世纪先重豪放后转婉约的思潮也与时代的风云与时人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至于今天,伴随着时代的进步与思想的开放,人们更期待并包容多元化的探究与阐释。

参考文献:

- [1] 胡适. 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97.
- [2] 施蛰存. 词的“派”与“体”之争[J]. 西北大学学报, 1980(3).
- [3] 谈文良. 宋人是否以婉约派分词派等三题[J]. 西北大学学报, 1981(1).
- [4] 吴世昌. 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J]. 文学遗产, 1983(2).
- [5] 吴世昌. 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J]. 文史知识, 1983(1).
- [6] 李秉忠. 也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兼评吴世昌先生等人的观点[J].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 1988(1).
- [7] 万云骏. 论词的艺术性[J]. 学术月刊, 1962(2).
- [8] 吴文治. 婉约派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 光明日报, 1964-08-30.
- [9] 万云骏. 试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评价问题——兼评胡云翼的《宋词选》[J]. 学术月刊, 1979(4).
- [10] 詹安泰. 宋词散论[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

(责任编辑: 黄声波)